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大转折

大决策

大思路

大讨论

大解冻

划时代的 会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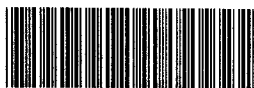
Huashidai
De Huiyi

张湛彬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0103522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201035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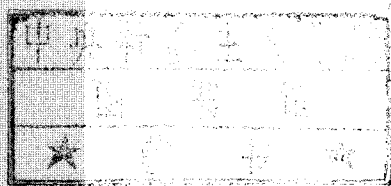
划时代的 会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Huashidai

De Huiyi

张湛彬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兴权

装帧设计 丁 明

划时代的会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湛彬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2-01575-X/D·264

定价 13.00 元

印数 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大解冻	1
一、收审“四人帮”	1
二、邓小平复出	8
三、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18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	25
五、经济界的务虚	38
六、打开国际社会通道	43
七、小平北巡	48

第二章 大讨论	56
一、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56
二、陈云抱病发言	59
三、华国锋宣布重大决定	67
四、工作重点转移达成共识	70
五、对人民公社的质疑	75
六、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酝酿	85
七、中央政治局的调整	109

DI28/09

八、真理标准讨论再度成为热点·····	112
九、华国锋、汪东兴的检讨·····	119

第三章 大思路 ·····	123
一、邓小平亲撰提纲·····	123
二、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	130
三、邓小平的经济底牌·····	138
四、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140
五、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145

第四章 大决策 ·····	156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56
二、划时代的决策：工作重点转移·····	167
三、树起改革开放的旗帜·····	172
四、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	177
五、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80
六、中央政治局改组·····	185
七、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190
八、1979年开门头件事：传达三中全会精神·····	197

第五章 大转折 ·····	215
一、大转折起步·····	215
二、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	223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226
四、邓小平评十一届三中全会·····	240
五、江泽民评十一届三中全会·····	250
六、专家学者评十一届三中全会·····	258
七、海外视点·····	265

主要参考书目·····	274
-------------	-----

第一章 大解冻

痛苦和灾难频生的 1976 年，由于“四人帮”被收审而转变为走向光明的胜利年。其后，中国社会开始解冻，尽管在乍冷乍暖中还有“两个凡是”等等“左”的余波迎面扑来，但严冬的日子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一、收审“四人帮”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党受难，国家受难，人民受难，中国社会遭受了严峻的考验。怎样才能走出这混乱的泥潭？怎样才能迎来新时代的曙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思索，老百姓也在思索，千千万万人都在思索！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顺应时势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没费一枪一弹，几个小时就完成了那惊天动地的壮举。后来，人们常常讲起“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一举”并不是执行哪个人的意志，而是执行了人民的意志。正因这“一举”意义非凡，所以载入了历史史册。

就在收审“四人帮”的当天晚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云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当晚10时在玉泉山紧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重要讲话。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并就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强调的重点是，拘捕“四人帮”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接着，叶剑英也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重点说明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

这个会开了一个通宵，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惊喜中一致同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1976年10月8日到1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并初步揭露了“四人帮”一伙阴谋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10月8日，华国锋在会上说，批“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一伙的批评事实，作出了对他们一伙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通知基本上执行和体现了10月8日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的基调和精神。

尽管当时“左”的错误尚未清除，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毕竟是件大喜事，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

愿望，因此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呼。

10月24日，首都10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吴德在大会上讲了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第二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的社论。这篇社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的基调精神，论证了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

华国锋把党对“四人帮”的斗争界定为政权问题，其实质仍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所以才能得出“他们采取种种手法，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的错误结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行动部署。应当说，这篇社论较好地体现了华国锋的政治意图。

郭老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道出了亿万群众“大快人心事”的喜悦；一曲众人传唱的《祝酒歌》，唱出了“杯中洒满幸福泪”的万般感慨。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就成了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的突出主题。

粉碎“四人帮”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同样，揭批“四人帮”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说它“尖锐复杂”是因为揭批斗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遇到一个非常棘手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护毛泽东和正确评

价毛泽东思想问题。

揭批运动一开始，国外一些不明内情的人士议论纷纷：打倒“四人帮”是反对毛泽东，是否定毛泽东，是搞“非毛化”。“反对江青的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实行‘非毛化’的前奏”，“‘非毛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揭批运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国内外的种种错误观点，用大量的事实向世人反复说明：第一，毛泽东在世时对“四人帮”作过严肃尖锐的斗争。第二，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内乱中搞的罪恶活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意愿。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专案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党罪行，并搜集汇编其罪行材料，准备下发各部门、各地区，提供批判材料。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汪东兴负责。

中共中央首先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把持的宣传舆论阵地，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协助中共中央管理全国的宣传工作。接着恢复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军队系统、在京宣传单位负责人共133人。中央宣传口耿飏、朱穆之、李鑫参加了会议。耿飏首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并根据宣传要点的精神讲了话。宣传要点主要有三个：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

会议初步揭批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破坏宣传理论战线工作的罪行，讨论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与意义，部署了揭批斗争的任务。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对当时的宣传工作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

会议强调突出宣传华国锋，继续新的个人崇拜；揭批“四人帮”限于批右、不批“左”的指导思想，对揭批“四人帮”也带来很大阻力。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开始了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的第一个战役。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人帮”要害是篡党夺权》的社论。

197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中强调指出：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但是随着斗争的展开和深入，阻力和干扰也越来越大。

一个很大阻力来自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

（一）他们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规定凡是毛泽东看过、点过头、批示的都不能碰，更不能批。

（二）他们对揭批运动定调子，认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必须批判他们的极右实质，而不能批“左”。

（三）对揭批“四人帮”划出许多新的“禁区”：一不准触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二规定揭批查的重点放在中共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的事实。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有的不同意华国锋、汪东兴审定的报告里说“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指出：林彪、“四人帮”之所以采取极左的形式，这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极高的威望；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革命传统；由于我国存在着广阔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极容易被利用，容易导致极左；由于建国以后我们注意了反右，对“左”倾倾向注意不够，而且长时间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说法、做法的思想观点。但华国锋等人拒不接受与会者这些持之有据的意见和

观点，坚持批极右的观点。这种定性，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发展和深入。

针对上述情况，党内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坚定的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措施，排除阻力和干扰，把揭批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对于来自党内、特别是华国锋等人的阻力，则通过学习、讨论、争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突破。整个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在不断排除阻力与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主的第二个战役。

各大报刊登载了许多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广大干部群众、知情人士向中央揭发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四人帮”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并利用“文化大革命”逐步进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层。他们表面上标榜自己“最最革命”，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威望，鼓吹个人崇拜，以树毛泽东的权威来树自己，使自己成为“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忠实“接班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党章规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出组织处理。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称：“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阴谋集团。《决议》指出：

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

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向全国通报山东、上海、云南、辽宁等省、市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和经验；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调整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调整了中央党政军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开始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理论的第三个战役。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各方面表现，并先训练好骨干，做好宣讲、批判工作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这份“材料之三”尽管是关于“四人帮”思想、理论、路线方面的材料，但对于“四人帮”的重要反革命理论触及不多。这和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和专案组的负责人汪东兴的思想偏差有一定关系，汪东兴认为“四人帮”没有什么思想和理论。

在第三战役中，广大干部群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关系新变动论”、“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论”、“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论”、“全面专政论”、“黑线专政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终于突破了华国锋、汪东兴设置的重大禁区，点名批判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在十年内乱期间影响甚大的重头文章。对于这两篇文章，理论界于1977年就已撰文批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了吴江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

《红旗》杂志给汪东兴打过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这两篇文章。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评。”并将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一定要严格执行。

汪东兴的这一批示当然给思想理论界划出一个禁区、扣上一个“紧箍咒”，大大影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但是，勇闯“禁区”的理论工作者毅然抛掉“紧箍咒”，逐步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开创了揭批斗争的新局面，开始触及到“四人帮”的实质性的东西。

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排除阻力，经过三大战役，历时两年多，到1978年底基本完成，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指导思想尚未转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尚未审理的情况下，揭批查运动也存在深度不够和一定的失误，值得认真总结。但总的说来，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使党和国家有必要和可能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邓小平复出

随着揭批查斗争的深入，许多干部和群众逐渐认识到“文化

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危害，因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人民群众希望平反天安门事件，希望邓小平复出。这两件事是连环扣，但若不打开这两个连环扣，一切都无从谈起。

可是这种正当要求却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压制。

1976年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门在传达华国锋的四条指示中讲到：

1.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2.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3.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4. 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

1977年1月21日，经华国锋审阅修正的讲话稿第三稿中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

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

华国锋依托的“两个凡是”已初见眉目，即将定型。

在汪东兴布置下，上述尚未见诸报刊的“两个凡是”的内容稍加修改，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写进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经华国锋最后审定，批准中央两报一刊发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概括。这两句话，也就是引发党内激烈斗争的著名的“两个凡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

纲》发表之后，就有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和尖锐批评。

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胡绩伟为什么这样说？很清楚，如果按“两个凡是”办事，急待拨乱反正的事业无法启动。

要打破坚冰，的确需要有比坚冰还硬的意志。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前夜，面对迷雾弥漫，邓小平艰难而又坚定地走到斗争的前列。

1977年1月，北京长安街和南京、广州等地相继出现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尽快复出，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呼声。

粉碎“四人帮”后，从党和国家前途出发，从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出发，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尽早让邓小平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这期间，邓小平正因病住在医院。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道：

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①

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叶帅和小平，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战友。1975年，叶帅主军，小平主政，两人配合十分默契。这友情和信任，不仅来自数

^① 范硕：《叶剑英在1976年》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十年共同奋斗的经历，而且升华于重大关头的相知相交。邓小平的举重若轻，敢为善断，特别是追求真理的不屈意志和把握历史变革的勇气、魄力，使叶帅深信，在如此巨大的变革关头，非举小平担当大任不可。叶帅当时就说过，小平是我们这些老师的“领班”！

对于叶帅的提议，一向持重的李先念也赞同说：“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但是，华国锋却始终不表态。这对于华国锋似乎的确是有些为难，他刚提出“两个凡是”作为“治国良策”，兴奋的心情尚未平息就有人要求邓小平出来，而“两个凡是”却与邓小平出来水火不容。华国锋打心眼里感到为难。

叶剑英曾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

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①

然而，华国锋在高级干部打招呼会议上讲揭批“四人帮”时，是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列的。形象地讲，华国锋是一只手打倒“四人帮”，另一只手按住邓小平。

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针对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仍极力维护华国锋意见的权威，他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① 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编：《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